

第十六篇

鄂 豫 皖 苏 区

第 一 章

到鄂豫皖的途中

我在上海仅仅工作了两个多月，便踏入了苏维埃战争的前线；从此，开始了我五年的游击生涯，我所亲身经历的，也可象征当时各地苏维埃红军的实况。

一九三一年三月中旬，我和沈泽民陈昌浩准备进入鄂豫皖苏区。我和陈昌浩拟经汉口前往黄安，沈泽民和他的太太张琴秋则拟经安徽合肥去六安。当时，我们对于鄂豫皖苏区的情况，知道很少，我们只知道那里有两个小苏区，一个以黄安县北部的七里坪为中心，包括黄安麻城光山罗山四个鄂豫交界县份的一些乡区，另一块则以金家寨为中心，包括六安霍山商城三个豫皖边县份的一些乡区。这些苏区与中共中央之间建立了交通网，但彼此间互相联络的情况，却只有周恩来才清楚，周恩来因此委托顾顺章为我们安排这次秘密旅行的各种事项。

顾顺章一直主持中共中央的特务部，归周恩来指挥，是周的得力助手。这时，顾顺章又实际主管中共中央通往各地和各苏区间的交通网。顾顺章原系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，清帮的活动分子，五卅运动时即系工人领袖之一；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三次暴动，他任工人纠察队总

队长，周恩来曾一度任顾的副队长；此后，周经常是顾顺章的领导者。我还是在五卅运动时与顾顺章认识的，那时我就欣赏他的能干，这次重逢，已相隔五年多了，他的才华更是令人佩服。不过他的仪表谈吐，多少有些海派气味；也许这点是他为人美中不足之处。

顾顺章为我服务，十分卖力，他决定亲自护送我到汉口，沈泽民的行程则由他的助手料理。他告诉我，有一艘来往沪汉之间的野鸡船，与他有密切关系，这艘船将于三月底开赴汉口，他要我坐那艘船，他自己则先赶到汉口物色人员护送我去黄安，他并详细向我说明每一细节所应采取的步骤，我决定照他的计划实行。

那艘野鸡船定于四月一日启碇，三月三十一日晚九时左右，顾顺章的助手雇了一辆街车来接我，于是我和我的太太告别，离开我的秘密住所，搬到南京路新世界旅馆。这家旅馆也是与顾有密切关系的，常为他利用作为活动的据点，这时他早为我预定了一个房间，连旅客登记表也代我填好了，注明我是由香港刚来的，以应付可能的盘查。我预定在凌晨三时上船，顾则搭夜车往南京，再转船赴汉，可先我一日到达。

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凌晨三时，我扮成普通商人，顾顺章的助手扮成我的伙计，街车司机虽与我互不相识，却也是一个同志。我们在夜深人静时直驶杨树浦码头，到达码头时，曾有一巡捕来查问，我的伙计下车应付了几句，便通过了，此外，并没遇着甚么阻挠。到达船上水手舱中时，陈昌浩已先我在那里，并为我在他铺位的旁边占了一

席地作为我睡眠的地方，陈昌浩也是扮成我的伙计，他在那里摆出一副侍候老板的神气，为我多方张罗照料，我们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了上海。

晨光普照的时候，船开出了吴淞口。这是一只货船，十几位客人都是水手们私带的“黄鱼”，我们这两条“黄鱼”，虽同是商人打扮，但又有点不象。水手和客人多猜测我们是贩卖鸦片的巨商，于是我们将计就计，和同船的人一起打麻雀，我们立定主意，输一些钱，而我们的技术确实蹩脚，输钱时也显得很自然。几天工夫，我们输了近百元的大洋，同船的人皆大欢喜，认定我们是一掷千金的大鸦片商。

四日下午，我们的船快要到汉口了。顾顺章嘱咐船主要在下午六时后靠码头，因为顾顺章认为六点多钟是暗探们用膳的时间，那时登岸，危险性可能少些。果然，这艘船马上减低了速度，直到六时过后才停泊好。我和陈昌浩各提着简单的行李，走出码头的时候，天已近黄昏，码头外的要道上，有一个年青人手里拿着一张当天的报纸，向我们投射了一个暗号，这就是顾顺章派来接我们的。那青年人旋即坐上一辆人力车，我们也跟着坐上人力车，直向离码头不远的日租界驶去。

在日租界一条较僻静的街道上，我们走进一所房子的二楼，顾顺章已在那里等候我们，他知道我们一路上没发生过甚么困难之后，便和我们研究下一步的步骤。他告诉我们，从这里到鄂豫皖区，不能由汉口交通站的人护送，须由鄂豫皖派出来的交通迎接进去，现在已确知那个可靠

的交通，至少还要三天才能赶到，因此，我们至少要在汉口停留三天。

接着他又告诉我们，这个交通据点，住着一对可靠的夫妇，一向是很稳妥的，但据最近的消息，这里已引起日租界暗探的怀疑，因此，他对我们是否可以住在这里，颇表踌躇。他还告诉一件我向来不知道的事，他说他是有名的“花广奇”大魔术师，曾在汉口表演多次，轰动一时，汉口有些大商人和富人曾拜他做老师，其中有几个和他来往亲密，完全不知道他就是顾顺章。他建议如果这里不好住，可以搬到他的一个学魔术的学生家里，那是一位大商人的家庭，不会引起人们怀疑的。我不同意顾顺章这个建议，我对他说：如果我住在大商人家里，不能躲藏着不见客，汉口认识我的人很多，商人中也有不少人认识我，万一遇着了，反为不妥。这里虽已为日租界暗探所怀疑，但不见得在这几天内就会出事。我们就藏在这里，决不露面，也许要妥当些。我们研讨的结果，一致认为还是一动不如一静。

在这个仅有两间卧房的二楼上，主人夫妇住在后房，我们则住在前房。我们不敢凭窗外望，以免为人所发现，只有在房里阅读书籍报纸。当日一份中文报纸上，译载一篇外人所作“剿匪”的文章，其内容大致是赞扬蒋介石将军剿灭共匪的努力，并说到中国历史上曾屡次采用封锁政策剿匪，获得成功，现在蒋氏也注意封锁，沿着匪区，筑碉堡，坚壁清野，使匪不能向外发展，以图逐渐缩小包围，这是一个稳健而有效的办法。我读了这篇东西，便开始考

虑对策。

七日傍晚，顾顺章领着刚由鄂豫皖区来的交通到我们的寓所。这位来迎接我们的青年人，身材矮小，沉默寡言，倒象一位经过磨练的商店伙计。我们商定翌晨启程，乘公共汽车向目的地进发，顾顺章因不便在汽车站露面，决派他的助手到站照料。

八日上午八时，我和陈昌浩跟着那位交通，离开日租界，穿过中国地界的小街小巷到汽车站。我们各自提着包袱雨伞之类，前前后后各自行进，似乎并不相识，在车站分别买票，我们很顺利的搭上了经黄陂到麻城李家集的公共汽车。车开行到郊外时，曾停车经过两次检查，我们没有遇着困难就通过了。

同车的旅客，在通过检查以前，是鸦雀无声的，似乎惧怕将要发生甚么岔子。检查完了之后，大家就有说有笑。车中有人说，车抵李家集时，还有一次更严厉的检查，不过有店铺在那里的人，就没有甚么麻烦。他们纷纷议论，李家集街上驻扎的军队和民团太多了，买卖不如以前好做了，共匪常在李家集附近骚扰，被绑架去的人不少，某商店的老板某某，就是前几天被绑去的。我听了这些话，知道我们的游击队，确是很活跃，但绑票的行为，不但会失去人心，而且是土匪的作风。我这个不会说湖北话的人，只有装着重听，不和人交谈。

下午四时左右，我们到达了离李家集八华里的一个小站，就在那里下车。交通领着我们循小路向乡村走去，翻过几个小山坡，离公路已经远了，那位交通才放慢脚步与

我们同行。他告诉我们现在大致没有危险了，从那个小站到我们所要到的村庄共十五华里，现在还须走一个钟头才能到达。我们最好是在黄昏后到目的地，以免为人注意，因而我们慢慢的走反较好些。

这时我才有机会和那位交通谈谈关于交通网的情形，他虽不知道我的姓名，但他知道我们是他的重要上级，因此他也不避嫌疑的告诉我们。他告诉我：他就是本乡的人，这里的农民协会，从前组织得很好，反动以后，农民协会被禁止了，一切的活动也没有了，但农协的影响仍是很大的。现在我们所要到的村庄住着同姓的二十多户人家，都是同情革命的，其中有两户与中共有关系，其他各户则暗中掩护。我们的游击队，也把这个乡村当作同情区，从不在这里打土豪，因而维持着友好的关系，他每次出入鄂豫皖区，都是以这个乡里的两三个村庄为落脚点。

他又告诉我，有一个交通站，设在李家集附近大路旁的一间小铺里，汉口的总交通站，只知道那个地点，这次就是汉口总交通站于几天前通知那个小店铺，转知他来接我们的。他自己只知道汉口一个接头的地方，他每次赴汉就是到那里接头。他推测在鄂豫皖的周围，有好几条直达中共中央的交通线，他自己知道这一条。

他又说，在我们所要到的村庄上，藏着一个鄂豫皖苏区的特务队，是专来迎接我们的。我们今晚还要走一晚的夜路，沿途要穿过白军和民团驻防的地方，才到达鄂豫皖苏区南端的高桥区。平常他走路的时候，无论是带领人员或运送东西，总是夜晚悄悄偷过去；因为我们是重要的人，

所以特派一个特务队来接。

在暮色茫茫中，我们从后门进到这个村庄的一个人家。进门后，立即看见有几个雄赳赳的青年人在那里守候着，那位交通将我们的身份告诉他们之后，那个特务队长，立时命令全体武装起来，顷刻之间，那些人都由普通农民变为佩带短枪的红军了。队长慎重向队员宣布：要严防民团来巡逻和敌人的任何袭击，誓死保卫这三位新来的人。

我们所到的这家人家，房屋相当的大，有好些个房间，男女老少一大群，都用惊奇而带喜悦的眼光望着我们。女人们忙着为我们料理食物，男人们则分别到外面去放哨。特务队队长和副队长带着八个队员藏在屋内把守前后门。

饭后，特务队长在征得我们的同意之后，下令出发，预定在拂晓前到达目的地。在行进中，队长带头，副队长殿后，我们则走在中间，沿途不说话，不吸烟，严防为敌人所发觉。

在没有月亮的黑夜里，我们这一队人，从村庄后面的小路，走过满布松林的小山冈，为了远离村庄和敌哨，我们必须绕道走，有时走山冈小径，有时走曲折的田畦，有时走的简直不是路而是碎石沟。一路看不见灯火；听不着狗吠，我们一意急行。

我此行的心情，轻松而又愉快，和我在南昌暴动失败后，夜奔甲子港的狼狈状态，恰恰相反。我觉得我此后的生活是改变了，用不着提心吊胆严防暗探的追踪了。我面前这十个敏捷矫健的游击武士的英姿，使我想起明早将要会见上万个同样的人物，我将和他们一起奋斗，我为此感

到骄傲。

我这个不惯于行夜路的人，越走越觉得我这双脚有些不济事。我在黑夜中急行，高一脚，低一脚，有时脚被石块打着发痛，有时跌交，我用尽气力还不免掉队几步。走在我后面的队友，老是鼓励我不要掉队，甚至轻轻的哼出一首掉队歌，其中一句我记得是：“掉队的人儿，哎哟哟！不怕羞！”我不甘落后，决心锻炼自己能和他们一样的矫健。我虽满头大汗，走上坡道时还有些喘气，但我咬紧牙关，竭力赶上去。

这一整夜的行程，我们中途只休息过一次，并用缸子在一个小溪中汲取了一点水喝。高大个子的陈昌浩有较多的体育锻炼，也要费尽气力，才勉强跟得上。特务队长曾向我表示，他知道初走夜路是一件辛苦的事，但我们如果耽搁了，就要准备与民团开火。我鼓起勇气，请他放心，我会努力跟得上的。

天微明——这是一九三一年四月九日，我们的队伍才放慢脚步，队长选择了适宜休息的地方，要我们解下包袱，多休息一会。他指着前面一座高山告诉我们，那是木兰山，高桥区就在那座山东面脚下，我们已经走出了民团的防地，前面那座小山冈上，就有我们的哨兵，到黄安独立团团部则还有十里的路程，昨夜我们所走的路，按大路计算是八十里，但我们弯弯曲曲的走小路，约计有一百二十华里。

这最后的十里路，我们可走得慢了，而且时走时歇，队长也不再督促了，全队行进的速率都随着我的脚步为转移。我拖着沉重的脚步，好不容易的向前移动，快到八点

钟了，我们才走到山窝的一个小祠堂内，这里就是独立团的临时驻地。

独立团团部的人们，围拢来欢迎我们，但我已没有精神和他们周旋，我赶紧解脱我的鞋袜，看看我的双脚，使我自己也为之惊奇，原来两脚已布满了水泡和由鞋带子所勒成的血渍印。我的同志们看见了也只有把我当作伤兵来服侍，忙着让我吃东西和休息。这个团里只有徐政治委员是在一九二七年武汉时期会见过的，他除了为我介绍这个团的王团长和徐政治部主任以外，并安排我有几个钟头的休息时间。这就是我踏进鄂豫皖苏区的起点。

第二章

初次参加游击战

我一踏进这个苏区的边缘，就参加了游击战。初次参加游击战的情景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
一九三一年四月九日近午，团部的大厅里有二三十个人在聊天；长官与士兵杂坐着，毫无拘束的谈笑。他们彼此互称同志，对于长官则在“同志”之前加上一个官衔。他们的总称是“红军战士”，没有在军队中工作的人，则称军队里的官兵为“红军同志”。官长和士兵的服装是一样的，使人分不清那一个是长官，那一个是士兵。独立团官兵的服装不及特务队的整齐。官长和士兵起居饮食都在一道，待遇也是平等的。他们这种同甘共苦的生活，滋生了他们活泼与乐观的团结精神。

先我起床的陈昌浩，已在大厅里和他们高谈阔论了。他们想知道鄂豫皖苏区以外的情形，特别对于我们这两个新来的人，大感兴趣。我听见有人问陈昌浩说：“国涛同志不是机会主义吗？”陈说：“这是早就过去的事了。”并告以现在我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，能全权代表中央，此来是任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的书记，兼军事委员会的主席。他要他们称我为“主席”，一切听从我的指挥。他自己也自我

介绍，说他初从苏俄返国，任少共中央委员；此来是担任少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的书记。但他自己则不仅注意青年工作，对游击战争亦极感兴趣，而且身体强健，曾受过一些军事训练等等。

我起床后步入大厅，间杂在他们当中坐着，全厅的视线都集中到我的身上来。王团长为我一一介绍，并告诉我那个护送我们来的特务队，是直属军委的，不过现在拨给他指挥，现在已到别处去休息了，并且已经分派他们新的任务。我请他代我嘉奖他们，并向在场的人说：“这里许多同志，都是我的老战友，我初来，许多事要学习，请随便告诉我一些情形吧。”同志们撇开我的问题，先向我叙起旧来了。徐政治委员说到一九二七年在汉口和我会见过。王团长接着说，一九二七年他到汉口，知道湖北区委由我负责，但没有见着我。此外还有两三个同志说在汉口听过我演讲，他们说比从前胖了些。

我们一面进餐，一面互道情况。饭后，王团长提出了一个军事行动的建议。他说这个黄安独立团只有六个连，共五百余人。现在驻扎在这里的是第一营的三个连，约有三百人，枪枝只有一半。他们在两天前到这里，任务是护送我们到苏区中心去，可是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，离这里约三十里的某地，驻扎着新开来的白军一连，他想带着队伍，去解决那个连。独立团的最大困难是缺乏子弹，每枝枪平均不到十颗子弹。他想我们今晚应在此间休息，独立团则去行动，以期虏获一些枪枝子弹补充军械。

我赞成王团长这个建议，并要他画一个行动略图给我

看。王团长和在座的长官都很熟悉这一带的地形，但却不会绘图。我告诉他们学会绘图是很重要的，如果没有行动战略图，我就不会了解他们的行动计划，部队长官的指挥，也不一定会准确。他们于是遵照我的意思画了略图，画得实在不高明，他们确是第一次学习，官兵们在那里七嘴八舌的纠正偏差，好不容易才把这张图拟定了。

接着，我告诉他们白军这个连已在那里驻扎了好几天，可能建筑了工事，最好能派一位干探去侦察一下敌军驻地附近的情况。那位瘦小的徐政治部主任，自告奋勇的愿意去，预计黄昏时可以赶回来报告。他在我们同意之后，就化装去了。不一会，这个原穿着军服的徐政治部主任，居然维妙维肖的化装成一个手提粪箕的拾粪农民。我非常高兴的看这个“拾粪农民”的背影，向对面的小坡走去。

午后，我休息了片刻，又更多的了解了这个独立团发展的经过。这个独立团是由农民自卫军蜕变而来的。鄂豫皖苏区各乡村都有农民自卫军的组织，按连营团的编制，每乡至少有一连，多的有一营；每区多数有一团，还有多于一团的。自卫军的士兵就是各乡村的壮丁，平时务农，有事时集合行动。这些自卫军统归各县苏维埃政府下的军区指挥部指挥，又名为“不脱离生产的地方武装”，各区乡的自卫军夺取了敌人的少数武装，便由自卫军中的精干分子装备起来，形成某区的独立连，独立连的士兵于是脱离生产，经常行动；这又名之为“脱离了生产的地方武装”，也就是由自卫军转化为红军的一种过渡组织。这种独立连通常人数是足额的，武器最初只有一二十枝步枪，多数无

枪的士兵仍携带梭镖作战。步枪逐渐增加的结果，也就能单独担任游击的任务。这个黄安独立团，就是由这样的六个独立连编组起来。

那位农民出身的黄安独立团王团长，在他的同伴中，资格算是最老。一九二七年初，他已是中共党员，当地农协的负责人。武汉分共后，他是高桥区一带率领农民打游击的少数领袖之一。那时他已是这里唯一的土生土长的游击健将了。他的同伴们都敬佩他，但也有人批评他“老大”（即自视资格老有些自高自大的意思）。那位徐政治委员被称为“大徐”，而徐政治部主任则被称为“小徐”，他们都是学生出身，在这一带工作很久，游击战的经验则不算丰富。团部里参谋文书等人员都是本乡的低级知识分子出身（有的是道士的徒弟，有的读过几年私塾或小学）。连排班长多数是因战功而提升的，少数则是红军中的战士，因不愿背乡离井乃留驻当地，或因作战受伤，痊愈后便被派到这里来。

正规红军在鄂豫皖区只有第四军，组织比较健全。地方武装的独立团在组织上则远不如正规红军，它没有机关枪，这是与正规红军不同的第一点。它没有单独的卫生组织，伤病兵都得交由当地苏维埃政府处理。它也没有单独的补给组织，全团官兵从来未领过薪饷，只是按时由当地苏维埃政府，杀猪宰羊，犒赏一顿。全团所需被服鞋袜，也由政府发动农民代为制办。他们在苏区内驻扎时，由政府供给伙食，到白区行动时，就自行打土豪，解决补给问题。

到了黄昏，我们的“拾粪农民”回来了。他手舞足蹈的告诉我们，一切都侦察清楚了。他在那连白军驻地附近，拾了满筐的粪，白军士兵就地拉矢，其驻地四周的粪真是多极了。他已将满筐的粪交给前面一家农户，赢得农民的谢意。他侦知这一连白军都驻在那个山坡上的一所庙里，庙旁的山冈上筑有一个圆形工事，但没有设置障碍物。通往那个庙的道路，以及构筑工事附近的情形，他都弄清楚了，沿途民团驻地也没有甚么变动。

王团长根据徐主任所侦知的情况，下达夜袭命令，时间算得十分准确。十时，这个独立团的第一营，就已集结在团部门前的广场上。我对他们作简短的讲话，嘉许他们的英勇，鼓励他们努力争取胜利。这个队伍旋即按计划悄悄出发了。我、陈昌浩和那位交通以及几个病兵则留在团部内休息，由留下的几个兵为我们警戒。

翌晨，天将晓，一个从前线归来的传令兵，高声向我们报告胜利的消息，并说王团长带着队伍，随后就到。不久，得胜归来的王团长向我报告，他们已解决那连白军的大部分，获步枪四十余枝，子弹约五千发，俘虏五十余人；除已将所获枪枝弹药，由各连分配外，俘虏经过简单的宣传后，已经释放了。我方仅有几个轻伤，已送往高桥区苏维埃政府照料。

王团长等都向我道贺，说这次胜利是我的正确指导所获致的。徐政治委员更说到这次行动因有徐主任的侦察，没有经过甚么激烈的战斗，就进入了敌人的驻地。除黑暗中逃跑了一些人以外，敌人概被包围缴械。以前每次行动，

多是带着队伍出发，看见情形有利，就干起来，否则退回来，不免空跑一趟。这次计划准确，因而获得空前的胜利。他们在回途中，检讨战绩，大家一致认为如果没有我的提示，似不会有这样圆满的结果。

我同样为他们祝贺，并说这是全团官兵和苏区民众一向英勇奋斗的结果。我还向他们说到下次行动时，要注意缴获敌人的文件，并带回一两个俘虏，以便询探敌情。敌人弃置的军用品，如工作器具等，都要虏获回来。他们赞成我的意见，也承认他们自己“游击习气”过甚，只注意虏获枪枝子弹，其他就不大注意了。

十日午后，这个得胜的队伍护送我们向北进发。由独立团驻地（苏区的边缘）到高桥的中心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，有三十华里之遥，那是我们所要到达的目的地。我开始领略苏区的一般情况。

这一营人装备着新虏获的枪枝子弹（每人平均有三十发了），精神抖擞。在苏区内行进，不用戒备，可以时行时歇。我这个走坏了脚的“伤兵”，坐在临时用竹竿扎好的轿子里，随同团部在队伍中间跟进。我们胜利的消息，早已夸大的传遍了各处。沿途的农民争着来看我们所虏获的枪枝子弹，和我这个来自中央为他们所称誉的“赛诸葛”的丰采。

当地农民与独立团的官兵相处得水乳交融，沿途有不少农民伴着队伍一同走一段路，祝贺胜利之声不绝于耳。他们和独立团官兵的谈话，也是极其亲切，看见我坐在轿子上，他们有的以为我是被俘的土豪，因而说：“为甚么不

把他四脚朝天？”或者说：“好一条白肥猪！要值串把大洋吧！”战士们抢着纠正说：“不要瞎说，他是我们的中央。”农民们听了“中央”二字，仿佛是“真命天子”似的，不禁伸伸舌头说：“中央呀！领导我们打胜仗的中央呀！了不得，我说错了！”

我们的队伍在沿途村庄上休息的时候，农民们兴高采烈的将准备好了的茶水，供给战士们解渴。村庄上男女老少都围拢来观看，战士们也非常和蔼的告诉他们，我们是新从中央来的人，特别将他们新缴获的枪枝子弹，夸示一番。这种与农民亲若家人的情趣，是国民党区域里所看不见的。

这些事使陈昌浩高兴得了不得，他觉得出乎意外的发现了许多奇迹，特别是战士与农民的亲密关系，军民对中共中央的信仰，军民一致进行游击战争等，为之赞赏不已。他在那里注意了解实况，也觉得他过去所学的军事知识，许多是不适用的，要从新学习游击战术。后来他终于担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的重要职务，成为灵活敏捷的游击健将。

下午五时左右，我们到达了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的一个大村庄上宿营。这一营人旋即分散住到各民房里去了。也有一些战士请假回家，情形显得有些凌乱。王团长曾向我解释，在高桥区中区，不用戒备，一切可以随便些；各班纷纷找他们所熟悉的人家去住，但他们都会集住在大厅里，不会出乱子的。有家在附近的战士，请假回家了，明早必能按时归队。

我们和团部驻扎在高桥区苏维埃政府的办事处。这是